文化 ·社会

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

行　龙

[**摘要**] 本文以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为中心，将他置身于所处的时代，叙述其五次科考、舌耕二十年、亦农亦商的一生。文章尝试打破“问题意识”的常规，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勾画清末内地乡绅生活变迁的轨迹。

[**关键词**] 刘大鹏　乡绅　生活

[**中图分类号**] K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05) - 02 - 0069 - 12

Possessing Unrecognized Talent: The Pathway of the Country Gentleman Liu Dapeng's Whole Life

Liu Dapeng was a country gentleman whose lifetime spanned both th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an Era. Liu took part in the imperial exam five times and taught at a private school for twenty years. He was a farmer and a businessman for many years in his home town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 system.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breaks with the convention of "question consciousness", using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narration to outline the track of the Liu Da-Peng's entire life.

引言：《退想斋日记》的发现与研究

刘大鹏——一个生活在清末民初普通内地乡村的普通文人，随着其自抒胸臆、持续半个世纪的《退想斋日记》的发现，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小焦点；在其家乡太原市晋祠镇赤桥村，顺应当地社会经济及旅游业的发展，刘大鹏的故事也成为街谈巷议的一个大热点，这对于一生怀才不遇的刘氏而言肯定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了。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日一记”的悠久传统。其中以清代日记数量最为宏富，刻本之外，手稿本和手抄本为数尤多，且多为亲身经历或见闻，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正是这样一种手稿本。

《退想斋日记》始于光绪十七年 (1891)，终于民国三十一年 (1942)，连续 51 年。日记以大 32 开纸张线装而成，凡“二百册”。其卷帙可谓浩繁，其发现整理亦可谓好事多磨。笔者 20 年前就读乔志强先生门下，应《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编辑组之约，曾为先生作传。在谈及先生早年搜集山西义和团史料时，他曾这样回忆道：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一次参观晋祠圣母殿，在殿前众多碑石中偶然发现《刘凤友先生碑铭》，便有收集刘氏文献的念头。很巧，山西大学图书馆线装书库有位老先生薛愈同志，世居毗邻赤桥的古寨村，人熟地熟，俩人一拍即和。不久，薛愈老先生在一位刘大鹏的亲戚家中找到这批珍贵资料。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由薛愈从收藏者家中临时借来数

[**收稿日期**] 2004 - 8 - 15

[**作者简介**] 行龙 (1958 —)，男，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太原 030006

册，乔志强先生不分昼夜地在学校摘抄。这便是业师乔志强先生 1980 年以刘氏《潜园琐记》为基本史料出版《义和团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基础。直止 1980 年代，业师发表的《山西地区的义和团运动》、《从“潜园琐记”看义和团》、《辛亥革命前夕学堂的兴起》等论文，大多引用了这批资料。

《退想斋日记》及刘氏其他部分手稿后来辗转入藏山西省图书馆。1980 年代初，乔志强先生有关开展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术思想渐已成熟。1982 年，笔者正式拜师先生门下，此年的研究生招生简章即明确标示“中国近代社会史”。记得刚进入一年级后半学期，先生便安排我到省图书馆抄录刘大鹏《乙未公车日记》和《桥梓公车日记》。两部公车日记抄录完后，先生又安排我和同窗徐永志抄录《退想斋日记》中的“有关社会史资料”，次年又有下一届研究生崔树民、王先明的加入。直到 1985 年四、五月间，仍有近半数日记未能抄录。此年暑期，我又从历史系本科高年级中请到三位同学去省图书馆整日抄录，事遂告终。采铜于山，求学如斯。如今想想 20 年前整日骑着自行车往 10 里开外的省图书馆跑，午间随便吃上点什么，再从不收门票的迎泽公园后门进入闲逛，不到下午开馆时间便又等候在门口，每天竟然能抄出近万字，那真是一种求学时代的辛劳与快乐。《退想斋日记》按照乔志强先生的意见抄录完毕后，他又再次标点注释并予删节（由原来的近 80 万字删节为近 50 万字）。1986 年 6 月，王庆成先生特邀至山西大学主持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生答辩，在一次乔志强先生的家庭早餐席间，笔者曾聆听两位先生关于出版《退想斋日记》的交谈。这就是 1990 年 6 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退想斋日记》的大概过程。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早在 1982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册，即已收录《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十八年（1902）有关山西义和团的资料（实际也是摘录）。

乔志强先生标注的《退想斋日记》出版后，也许是因为印数不多（仅 1500 册）的缘故，并未引起学界太多关注，笔者知道的只是先生及同门弟子的有关论著中有所引用。直到 1995 年，罗志田先生在台湾新竹《清华学报》25 卷 4 期发表《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及在三联出版的《读书》上发表《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退想斋日记》方为学界重视。罗志田前文以《退想斋日记》所记科举制废除前后 20 年的社会变迁，探讨四民社会解体这一社会结构变迁的历程，并进而通过透视刘大鹏的心态变化，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当引起反思的若干问题。后文又以刘大鹏日记为典型，论证近代中国存在着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一方的“两个世界”的观点。英国学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对刘大鹏及其日记情有独钟，1990 年代中期以来先后数次来太原实地考察搜集资料。2000 年 2 月，英国《过去与现在》杂志发表了她的《中国农村的报纸与民族主义》，该文通过分析刘大鹏日记所载各类报纸、传言、谣言、信件等传播方式，挑战近代民族主义只是通过报纸这一近代化人士操持的主媒体传入中国农村的传统观点。最近，沈艾娣的另一篇论文《华北的村落认同：刘大鹏日记中的地方感》（作者提供原文）又被收入科大卫、刘陶陶主编的《中国城乡——地方认同与地域观念》一书。此文从京师、省会（太原）、县城（晋源）、镇（晋祠）、村（赤桥）的系列行政空间入手，通过对刘大鹏日记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分析，指出城市和乡村、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等现代性的概念与区分，有其重要的社会历史根源。由行政区划到城乡区别，实际上是一个空间重建的过程。对刘大鹏而言，就是那样一种“地方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先生《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一文发表在《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三期（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该文分失意、守志、末路三部分，通过对刘大鹏日记的解读研究，彰显了科举制度废除前后私塾教师所体现的文化、国家、社会的种种权力，以此透析绅士与国家的关系。另外一篇发表在网上的论文《一个乡绅的心情——以〈退想斋日记〉为案例》，从

心理学的角度，将刘氏日记的每一篇所表露的情感状况分高兴、平和、生气三类以曲线形式记录下来，以此分析其情绪变化。虽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但在我看来，其研究的前提就值得打个问号。因为，作者现在看到的日记只是摘抄部分而非全部，在一天的日记中，刘氏也可能此事高兴，彼事则生气，何况日记本身就无所不包。又，《中国农史》2003 年第 4 期发表的任吉东先生的《近代太原地区粮价动向与粮食市场——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一文，也不失为一篇构思巧妙的论文。

物换星移。《退想斋日记》发现近半个世纪后始受世人关注。去年，欧洲联盟共同体开展“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计划”，在陕西、河南、江西、福建等省选取的七个普通乡村中，笔者申报的赤桥计划有幸被选中，刘大鹏及其日记又一次成为我必须解读和研究的重要文献。也许，冥冥之中我注定与业师持续着师生般的学术情缘，选取赤桥作为个案，实在是刘大鹏及其日记早已注入我的脑海。鉴于学界从“问题意识”的角度对《退想斋日记》已多有谈及，本文“避重就轻”以叙事的方式勾勒刘大鹏怀才不遇的一生，或许这是基础性的但又是必需的工作。

奋志青云：五次科考

刘大鹏出生于清咸丰七年五月十八日(1857 年 6 月 9 日)，世居太原县赤桥村。赤桥村邻晋祠，傍官道，人多经商，少务农，加以有丰富的稻草做为原料，造纸业相当发达，形成重商轻学的乡风，“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刘大鹏从 9 岁开始受业同里刘丽中先生门下，备读经史诸书十余年。23 岁时，进入桐封书院学习，得到王效尊山长的赏识。次年，他进入省城崇修书院学习，亲聆杨深秀等诸师的指授十余年，学业大进。光绪二十年(1894) 刘大鹏中举，实现了人生重要的一次跨越。①

按照清制，考取举人就有参加会试的资格，有了博取进士同时也意味着仕进的机会。1894 年的秋天，刘大鹏的心情是快乐的，笑容是愉悦的。登科中举，依照礼节拜客访友，则是理应之事。先在乡里“清晨即出门拜客，行遍里中，共拜二、三百家……去东里拜吾友”。然后“来太谷城内遍拜诸客”，又“省垣拜客”，乡里左右之邻村 12 个村庄他都去走动了②。人生得意之情由此可见，同时这也是对乡里“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认为“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钱，俾家道之丰裕”“读书无用论”的一个反证。科考仕进和业商致富到底哪个更容易实现，在关注日常生活的多数乡民观念中，无疑选择了后者，故而“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但一旦真正金榜题名，乡民会略去读书穷困无聊的过程，而去艳羡这一甜美的收获。刘大鹏在遍拜诸客的道贺声中，可能体会最多的是别人未得的书中滋味，他以自己证明了读书应该是令人羡慕的，读书是快乐的，读书可以“得志以行其道”。从此他生命的触角伸向了更辽阔的空间，而他作为一个绅士，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思想觉悟有了一种自觉，责任意识有了一种强化。此后他一生的作为和思想都和科考，都和士以及与之相伴的角色、觉悟、意识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1895 年也就是中举的第二年他开始了进京会试的历程。这是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旅程，是一次走出封闭世界的游历，是对自身学识的考查检验以及明了差距之后的追赶，对于贫穷度日的农耕家庭来说更是一次奢侈的盛宴。第一次，人生有许多第一次，惟独这个第一次让刘大鹏欣喜、新奇，一路春光，马不停蹄，从乡里走向帝国的中心，胸间是乘风破浪的壮志。一路上他看到了商人依附公车逃税，在会试往京十六日的行途中，平定州新兰镇税局客商报税，不税公车；固关“长城守关吏役稽查严密，往来商人无钱不得过，故上京商人往往与会试者相偕”，图免一番征敛之苦楚；芦沟桥“西设税局，无论品官行商，一律纳税，独不税及公车，凡商窃附公车而过桥者甚多”。抵京入门，官吏稽查出入亦“需索税钱，惟会试年不及公车”。对此，刘大鹏颇多感慨，以为“我国家待士之厚，于斯可见一斑也。商人至此莫不回顾徘徊”③。在远离“重商轻学”

的家乡道路上，关吏门吏稽查收税体现的则是“重学轻商”。在家乡社会，他以学以士自持自重，不仅经受着地方社会风气的逼仄，同时也常常面对自已对价值取向做出判决时心灵的考问。商人依附公车，过关而回顾徘徊，可能只是些小商小贩，也许富商巨贾对此不屑一顾，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会试公车享受着难得的特权，面对这一细节他心中所有的困惑释然而解。

山一更，水一更，半个月的行程，一生的梦想，与北京，与会试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位乡间士子审视着北京，感觉着北京，品味着北京。“京都宏壮，街巷纷歧，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炊烟成云，吐气成雨。”刘大鹏的笔下是京都宏壮给他的巨大视觉冲击。京都的风情更深深地吸引了他，琉璃厂里如山如海的经史子集，使他恍入兰台石室，目炫神迷，“有生平未见之书，浏览翻阅，爱不释手者甚多，恨己贫穷，莫能多购”。百货丛集，游人甚众的护国寺庙会，万寿山、颐和园的美丽风景，刘大鹏和几位年轻的士子犹如欢快的鱼儿。④

游玩只是偶尔的闲情逸致，来京会试才是头等大事，刘大鹏对考试之事“一事未晓”，一切全靠后来成为他的好友的郝济卿指示，才得以措置，拜座师，拜同乡京官，拜同乡商人。在这些必需的礼节中，他厌恶“最讲虚体面”的习俗，厌恶京都奢华的风俗⑤。但这些只是会试中的小插曲，而对于参加科考的刘大鹏来说更关心考试本身。考试场面宏大、隆重、严肃，是刘大鹏感受最深的。在考试过程中，细心的刘大鹏敏锐地注意到“乡试场中一切官员及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为‘先生’。会试场中一切官员及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老爷’。”称呼的不同，称呼和社会地位、角色密切相关，这种他者的确认和期待，这种层次的区别，实际上是对社会地位以及角色自我认知的折射，并且在不同层次的考试中体现、确认、强化。细节需要敏感的捕捉和仔细玩味，宏大的场面则是直接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憾，“会试场中较乡试局面甚大，官员亦多，贡院门口红顶戴者不少，闱中亦多红顶官长”，而且，“贡院中一切铺排，色色雄壮，办差臣工，莫不敬慎将事。”此种场景，刘大鹏由衷地感叹：“取士之典，何等郑重！”“国家取人，亦可谓之郑重矣！”

京都为学之士以习字为先（应试策略与技巧）引起了刘大鹏的注意。令人深可意味的是，在京考试之前，刘大鹏就已“见夫人才荟萃，其多如林，倍觉自己愚昧无知，无地可容，抚衷自问，抱愧良深”。这一直觉可能已经预示了以后科考的结果。科举制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分层选拔，但因为地域空间、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分属同一层次的人并不一定在同一水平，应该说刘大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没有选择这样的视角，而是把目光关注点放在他最大的发现——习字。在他看来京都“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联系到科考，他以为“我朝开科取士，乡试会试外，大率以字取者居多。殿试则是取字，朝考亦然，京都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试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殿试重小楷其实是晚清考进士殿试的常识⑥，刘大鹏对京都为学之人，科举之士以习字为先困惑不解。在他的心目中，字诚然要写好，但字好只是末技，重要的是“诚心读书以求根底”、“求义理之精”、“翻经阅史”⑦，京都所见“问写字不问所读何书”的学风和平素的学习观形成了一种倒置，深深引起了他的注意和感叹。事实上他的字应该是不错的。1938 年，有日军名吉实富藏者在刘大鹏家中坐谈，并向年届 82 岁的刘大鹏祈写四个大字，刘氏辞以写字太拙，久坐不允，日人遂去⑧。由此推知，刘大鹏对京都学士习字为先的学习风气持批评的态度。李鸿章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批评道：“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⑨刘大鹏并非批评科举制度本身，但他对京师学习风气的担忧应该说并不多余，而且颇有识见。⑩

1895 年刘大鹏赴京会试，适逢甲午战败，在现辑刘氏的日记里没有提及康有为公车上书这件事，但对甲午风云多有记载，对议和一事扼腕愤恨。国难之年，刘大鹏结束了他的第一次科考，下第士子，一路偕行南返，各归其家。

自京而返，经过了首次会试的洗礼，刘大

鹏似乎成熟了很多，他开始在舌耕之余，精心地打理着下次科考的行囊。他托弟子武人瑞从北京捎买了一箱书籍，御纂七经十六套、御批通鉴两大套共二十四本、皇朝经世文编四套共二十四本、皇朝经世文续编二套共二十四本、康熙字典一部。这书单背后是他周详的读书计划和怦然勃动的奋志青云之心。他用心研读丁日昌、冯桂芬、李鸿章、倭仁、刚毅等名臣大吏的奏疏例议，揣摩着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此时，中国社会悄然发生的变革已波及科举考试。在会试前夕的 1897 年，刘大鹏已经得知是年京师秋试设算学科的新例。他也听说了京师金坛书院取超等洋务一名，题为“子贡问师与商孰贤”，文以行师通商立论的事情，有人也劝他教子弟学习洋务，儒学的传统地位受到了西学的挑战和冲击。面对新变化新挑战，刘大鹏保守着孔孟正学，已显然落伍了。[11]

1898 年，一场春雪中，刘大鹏开始了二次入京会试的行程，应付了程式性的礼节，就开始紧张的三场考试。他记录了三场考试的题目，考试内容已极具“经世致用”的味道，充满了时代色彩。在头场考试中，刘大鹏自言“文虽不佳而却平妥”。二场考试因为寒冷难寝，手足冷冻难以写字，似乎受到了影响。而第三场的策题五道，问经问史问学校问兵制问钱币，已使刘大鹏“精神疲困，惟欲偃卧，无一点兴致也”。第二日“五更醒来对第五题策，天晓尚未半篇，至辰刻而完”。对于会试结果，刘大鹏认为“中与不中亦惟听天命而已”。从中可见刘大鹏的此次应试状态着实不佳，面对紧密联系时代命题的考卷，言语之间他已显得力不从心底气不足，考试的结果也可想而知了[12]。等待放榜的间暇，他和几位同年乘火车去天津游观，入东洋饭馆用餐，“浅陋耳目颇觉较前扩充”。接着，下第而归，“度居庸关，经上谷郡，至云中，历雁门、勾注诸山川，俯仰古今，”当然还有一路的吟咏。[13]

世纪之交的义和拳运动在山西引起了严重的教案。受“洋夷”之扰，晋省正常的考试秩序受到了破坏，1901 年晋省乡试停考，1902 年移至秦省，他的儿子在这次乡试中登科中举[14]。1903 年春节，里人吹吹打打送来了“父子登科”的匾额以示祝贺，刘大鹏率领诸子敬诣祖茔祭告，而以节俭为本的他在“情理之不能已”的境况下，宴请邻里乡党百十余人，共二十一席。父子登科也意味着今年的汴梁会试，是父子同行的历程。先是亲友来送，门闾填委，应接不暇。一路行程，到了汴梁，觅屋而居。他所住的棚板街，西通北大街，成为京、津、沪、汉之书商的麇集之地，时务等书，汗牛充栋，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而书商、书局乘势抬价，书商的名利之心令他厌恶。太原县参加会试的就是他父子二人。对于第三次会试，刘氏没有太多的讲述应试答题的细节，他详细地录存了考题，绘制了会试卷面、履历格式，描述了考试的场景并和以前北京的会试比较，他似乎是在对他科考生命做最后整理，他没有提及中与不中的话题，此起彼伏的民变让他倍感焦虑[15]。而当他返回家乡时，他的母亲带着对子孙的期盼而离开人世，这让他伤心不已。

刘大鹏三次会试下第而归，他并没有更多的嗟怨。1895 年会试同馆十人均名落孙山之外，愧言令馆减色，而刘大鹏则道：“科名有定，岂在人谋，况吾省只取十名，下场者二百七八十人乎？”[16]究其原因，固然存在着罗志田所说的种种外在因素，诸如：“像刘大鹏这样从中国腹地山西出来的读书人，就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17]，“那些举人以下未曾出省应试的读书人，大概就只有等到考试内容正式改变的通告出了后才能认识及此，他们也就更加无法与口岸地区的发展同步”[18]，“场中所考既然多为新学，两地读书人已不可同日而语，内地读书人与口岸读书人更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19]等等，但是就刘大鹏本人而言，对科考中与不中定于天命的认识、对新学强烈的排斥和抵触情绪、其自身知识水平和应试能力较为低下（有两个“世界”的因素，但山西每科仍有进士十数名）、为考试而考试的“应付”态度、“碰”的思想等在内的“科考观”，也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所以刘氏“叹自己志大而才疏”应是切实之语。他关注的似乎已不是科考结果，而是科考的过程、细节、场面，“尽管官场更不可能授予多数人以官职，但科场却成了每个考生都程度不

同要去分享的柯林斯所说的‘身份文化’的场域”[20]。以此来看，刘大鹏奋志青云科考仕进，不如说是周期性地进入科场场域体认自己的身份而已，如果说这成为一种例行，一种过场，其结果应该是情理之中。

废除科举，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破坏了社会上升性流动的机制，使得许多士人“布衣卿相”的梦想化为碎片。刘大鹏听到下诏停科的消息后，“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生路已绝”[21]。在失意的叹息声中，他无奈地走向他的下半生，但他仍住在科考的梦里，科考也住在他的梦里。民国21年12月15日一个寒冷的梦里，年老的刘大鹏竟然“夜梦登科之日，老伯孙君九和送钱两次，一次十七元大洋，一次十三元”[22]。

舌耕度日：塾师廿年

“在整个十九世纪中为数颇可观的绅士以教业取得收入”[23]。尽管山西经商的绅士所占比重较大[24]，像刘大鹏这样“为贫所迫”的绅士还是在读书科考之间隙选择了坐馆教书。但在刘大鹏的日记里，二十余年的塾师生涯却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无奈之举，他真情的流露给我们了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位内地乡村塾师的生活及心灵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

“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家有三石粮，不当猴儿王”。[25]教书一事，并非刘氏所愿，而是为贫所迫，藉舌耕度日，不过“暂为糊口计耳”，正如他所言：“吾家虽非赤贫如洗，究竟不甚宽绰有余耳，不然余何必出门教书也。”“暂为糊口计”，这是刘大鹏坐馆教书的理由，但他也曾坦言“读书之士若能于他处寻出糊口之需，即不可从事于一途矣”，无意间也显露出无路可行的实情。这或许是刘氏虽有厌烦教书生活种种理由，仍能支撑二十余年的主要原因。[26]

1892年，刘大鹏开始设帐授徒，1896年开始在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由于1909－1912年日记的缺失，刘氏具体什么时候结束塾师生涯，我们不得而知，但以1914年刘大鹏自述心志的日记中所说“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为据，他大约是在1911年失去东席之位的。在1914年的一则自述心志的日记里，刘大鹏则明确地写道：“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27]

在长达二十年的光阴中，刘大鹏塾师生活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教书授徒，承担“传道”这一崇高的社会责任并付诸实践，思索道统在学生的身上传承延续、考虑包括练字、读书、作文等在内的初级的系统的训练等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事实并非如此，他以教书为生计，不是没有一点“传道”的意识，但“流落教学一途，受东家之气，被弟子之恶”使他对此产生了怀疑：“或谓教学足以传道，而道之传者几何？”[28]教书在刘大鹏的眼中没有崇高的感觉而成为苦累不已的烦事。

在刘大鹏看来，坐馆授课有几方面影响：影响自身志向、学业、德行，即所谓“舍己之田，耕人之田，已涉自待之薄，志之卑、计之疏莫甚于教书一事”。此事不但耽误自己的功夫，而且大损己德。“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29]

不能尽孝事亲。“教书一事累人太甚，今因母亲大人之病，而去来不能自如，殊令人闷闷。”此后刘氏业已打定主意，准备待来年将馆辞了，躬耕以事其亲。后来他的想法并没有实现，所以不能事亲尽礼常使他抱愧不已，每逢节日，此情尤浓：“今日为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率皆陈肴设酒，为之庆贺，而余乃在外教书，远离二亲膝下，不能以菽水称欢，此心所大抱歉者也。”而在母亲离世后之清明佳节，刘氏虽有追源报本之思，因作教书客，往返不便，故缺此礼。在中元节，俗皆上坟祭祀，他在外授徒，未能旋家。而当众人皆上坟祭烧，为先人送寒衣之时，他在馆中，不能诣先墓为其母送冥衣，“哀痛之情，何其有极！”[30]

依人门户，自卑其身。刘大鹏视自己坐馆之事为“依人门户度我春秋，终非久远之计”。而在刘大鹏的家乡“重商轻学”的风气必然导致“轻师”，“当此之时学校颓废，士风不振，故有子弟者，虽请先生教书，亦是做为浮事，何尝郑重其事，敬礼先生哉！而为先生者亦以东家有钱，非惟不嫌东家不致敬，不有礼，而

反谄媚东家”。对此刘大鹏慨言:“师道之衰于今益甚。延师者视师甚轻,并不知敬重之礼。为师者自待亦卑,往往将就人馆,聊得糊口之资,以度岁月,世道之凌夷可谓甚矣。”㉛结果,教书之人虽然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却犹坐馆而不去,而作东家者遂以欺侮东席为应分。这在刘大鹏本人看来“真有负于读书矣”㉜。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则更为真切:刘大鹏的东翁家资数十万,家中无一吸鸦片者,不染骄奢淫佚之习,勤俭持家,极得刘大鹏称赞。应该说东家对待刘大鹏是尽礼而且厚道的,但不愉快总是有的。有次他可能向东翁提出辞馆,东家不太乐意,因而处处冷淡,一切饮食莫不与前大异。有一位张姓东翁,十余年间每年年底都要送刘氏礼物,刘氏赞其待师之厚,但其他东家非皆如是,刘大鹏颇为慨叹:“余在南席(村)十一年,阅数东家,修金而外,别无一物之馈遗,富汉无礼,于斯概见!”㉝富汉无礼,刘大鹏终没有辞馆,从他的行为和心理可以看出,他确然不同于那些自卑谄主者,但在长达二十年的塾师生涯中,似乎并非全是东翁东席之间的“礼”的契合,既然刘大鹏认为自己教书是依门户度日,这一个“依”字就道出了实情和无奈。既然有所依凭,势必要自卑自轻,这是传统社会下层教师共同的群体特征。

劳苦不自由。对刘大鹏来说,教书不难而是烦,就是出题课徒,为之删改,指其是非这样的份内之事,刘氏也认为“教书者之日事劳苦,不能间暇有如此者”。而其“教书一事束缚此身,不得自如,凡有些须别事,则受累不小”的牢骚,颇有“久在藩笼里,不得返自然”的味道。作为一种读书与科考之外的副业,在他看来设帐授徒以来的十五年,是所历艰苦不堪枚举的十五年。㉞

刘大鹏似乎对自己二十年的塾师身份难以产生自我认同,言辞间始终耿耿于怀而不能释然,尤其是中举以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因为这与自己的身份不符。他鄙夷周围一些塾师的道德和学问:“训蒙之人多不早起,亦不能早起。系由膏粱子弟出身,及长困穷,乃藉舌耕度日,究其学业不过粗识几字,而于学之根柢未之能知。”而更为可悲的是许多塾师自轻谄主,为贪求修金而丧失了独立人格。把刘大鹏和他们归为一类,刘氏显然不愿意。这也是刘大鹏对塾师这一职业不能产生认同的原因之一。

废除科考意味着刘大鹏科举仕进梦想的破灭,也宣告了他依人门户暂为糊口计的塾师生活的结束,以前自己对担任塾师一事所有的轻屑、厌烦,转而化作眷恋、追爱,对一些塾师的鄙夷、斥责,也变成了同情、宽容。实际上,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已下诏变法,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将各地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后来由于变法失败而没有推行,但这一措施在社会上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冲击。“近有废学校,裁科举之谣”,“人心摇动,率皆惶惶”,谣言真假不论,但这已令刘大鹏本人“二三其心”。周围之人有的“竟欲废读书而就他业”,而依刘氏对形势的判断,认为“士子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㉟。这是1896年的事。到190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绝无大兴之望”㊱。朝廷迫于形势,遂下诏于1906年停止科考。于是“同人失馆者纷如”,“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藉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往日旧友因实行新政,失馆无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㊲。相较而言,刘大鹏要幸运一些,没有马上失业,在1907年,他尚在馆中,但“弟子来读者无几,藉事不来者有之,托病间旷者有之”,已是一幅颓废的景象。不过,由于1909 - 1911年日记缺失,我们不知道这几年他充任塾师的生活情况。1913年,他已经充任晋祠蒙养小学教员,“日日晤对小学生,口讲指画,以四书五经为本而教科书为末,倒觉消闲”。但省里的巡视人员有时会到县里检查,仅许办理新学,不准诵读经书。他和检查人员演起了捉迷藏的游戏㊳。1914年新年伊始,他想起年前交涉修金的事,计划以后的路怎么走,陷入了沉思:“人之一生,皆有恒业以养身家,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遂令图生计,度此乱世”㊴。失去了才

懂得珍惜。原来的“暂为糊口计”，此时已是养身家的“恒业”。他最终认同了这一身份，但已是回眸一望的绝唱。1931年，他夜宿县城一个朋友的家中，此处是民国以来城中仅有的家塾。[40]

亦农亦商：晚年岁月

科考废，民国立，恒业失，惶恐、失落、无奈的情绪总要直面生活的困厄，为谋生计，刘大鹏下田耕种土地，以“老农”自称；入山经营煤窑，与“窑黑”共穴，过着亦农亦商的生活。

亦农亦商，其实是刘大鹏无可奈何的选择。舍此而外，刘大鹏不是没有他途别径。清亡而民国兴，但从政者“清廷臣工，十居八九”，在刘氏看来，若辈“系家无儋石之储，不得已而作二代之臣也，口腹之累，致使失节败名而亦莫能之顾矣”[41]。他在评点从政者名节之高下时，还是点出了生活所迫的实情。从政者如此，那么像刘大鹏此类的学绅，身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以生计而论，他该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向呢？刘大鹏是做过一些尝试的。1913年在“不得已而允”的情形下他担任了县议会之议长，但因坚持整理财政与众不合，其所行之事不能达所抱之志，只是“竭一己之心力，勇往直前，能进一步则再求进一步而已”。不能苟容于世，只能萌生退志，辞议长而去。刘大鹏在他的后半生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繁乱纷扰，这与他前半生亦读亦师单调而宁静的生活形成了显明对照。这大概是近代社会变革中绅士阶层共同的经历。他曾充任省咨议局议员、县议会议长、县教育会的副会长、县财政公所经理、公款局经理、县商会特别会董、县保存古物委员会委员等职。对大多数职务，刘大鹏多任职不久旋即辞退，这与刘大鹏正直的性格有关。一任一辞间，反映了科举废除民国肇兴的变革中刘大鹏矛盾的心态：从政之路，上则维持自己的绅士地位，下则为谋生计，关键是能造福乡梓[42]。然而“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即现在之绅士，多为县长之走狗[43]”。劣绅与贪官、土棍、流氓、村长一起侵渔百姓，民不聊生[44]。源自于各种名目的费征，只要关乎政府的运行，就只能袒护而不加追究，结果是“在县服务之人，绅士而反成痞棍，痞棍而竟成绅士！”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若不能自贬其身沆瀣一气，那就只能独善其身，以自己的标准去践履“如何是绅士”。

退一步来讲，教书一职对他来讲可能是最好的归宿。刘大鹏在辞退议长后曾充任过晋祠小学堂教习，颇感清闲间似乎找回了二十年私塾生活的感觉，也彰显了在新式教育兴起过程中，像刘大鹏这样的私塾先生转变为学校教员的历程。然而半年的身心不累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教资，刘大鹏“因无款辞谢其任，谋再办别物以求糊口之资”[45]。过了几年亦农亦商的生活后，1921年本县知事聘请刘大鹏为县立女子高等学校长，学生仅十数人而已，从有关的信息来看，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很短。而他再次执教已是七十六岁了，在家中教育四个乡里的儿童。他称自己所为是“罪恶之大者也”，而且自嘲“家有三石粮，不做猴儿王”。依然是生活所迫的无奈。[46]

1914年，新年伊始，又添一岁，正月初八，里中商号开市，张灯结彩，爆竹声声，纷纷扰扰，一幅太平景象。五十七岁的刘大鹏此时正打算着一年的生计。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他又一次陷入了沉思。停科举，兴学堂，使得大量的塾师失去坐馆之业，“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刘大鹏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立即丢掉了饭碗，至少在1908年，东翁仍然遣车来接赴馆。1911年清国灭亡，他丧失了西席之位。1913年他开始充任晋祠初等小学校的教师，聊以糊口，但他的薪水似乎在年底发生了问题，原来说好的款额他在年底仅拿到了一半。为了拿到另一半束修，除夕之夜他还在晋祠催讨，但他至二鼓而归无果而返，其心情肯定是颇为复杂的。对于一个绅士来说，若不是穷困所迫万不得已，肯定不会做出这样咄咄逼人有失斯文之举[47]。

此前，刘大鹏的父亲于1908年正月初一离世，其父生前于光绪十年十月（1884）在太谷李满庄[48]经营一家木店，店号“万义生”[49]。这家木店在他父亲死后继续存在，但刘大鹏好

像并没有亲自经营。1915 年正月，他曾在李满庄住过两宿，估计是去料理木店的事。1917 年由于生意凋零，应铺伙之约，刘大鹏曾去李满庄商量整顿铺事。此后十余年，木店生意如何不得而知，但木店在 1926 年仍然存在，一位姓李的“号掌”(店铺负责人）夜宿赤桥村，曾谈及木店经营状况。由于“工人甚形绌少”，店内木工工资涨价太高，“去年（1925）一年除号中日用火食及木匠之工资外幸获余利数十两”，而镇上的木店多行亏累。在商号倒闭纷纷，获利艰难的情形下，万义生木店能获薄利已属不易。1929 年，万义生号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买木料有纠葛，经人调停也莫能解决，后来刘大鹏招集木行之人公同合议，众皆以为买木系商家正当行为，不属盗买。后经李满庄村长及各位友朋从中调解，风波终得平息。1934 年冬季，刘大鹏前往李满庄，可谓物是人非。李满庄原为太谷县大村庄，刘大鹏父亲在此营业时村中富户甚多，村有二千户，而此时仅有二百来户人家，且率皆贫困，无一富户。此后，在刘大鹏的日记里李满庄再没有出现。万义生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刘大鹏家庭经济状况的变迁，从 1892 年他到太谷去看望父亲到 1930 年代，万义生至少经营了半个世纪，成为支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50]

刘大鹏家中的土地数量不是很多。在 1902 年春种时，刘家又添了几亩土地，数量总共十亩。其中旱田有三四亩，水田有四亩左右，种植水稻、小麦、玉米、谷子以及豆类、蔬菜等。每年种植小麦的亩数不尽相同，但大致保持在 2 亩到 7 亩之间，小麦的亩产量因年景的好坏而时高时低，正常的亩产量应该为一石左右，总产量大致在 200 - 800 斤。而保持六亩左右的小麦种植规模，所获五石左右小麦，也仅供全家数月之食。当然除小麦之外还有其他农作物，如水稻、谷子等，但日记对其产量的记载不详，可见小麦在解决全家之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其产量有限，仅能维持全家数月之食，这也说明仅仅依靠十亩土地，刘大鹏根本不能养家糊口。[51]

在刘大鹏的日记里，赤桥村并不是一个农业为主的村庄，造纸业是村庄的主导产业。里人皆以造纸为生，“务农事者十之一二，造纸者十之八九”[52]。但造纸业时好时坏，纸价时起时落，似乎不很稳定。虽然有关家乡造纸业的记载很多，但从中看不出他的家庭造纸的迹象，纸价的起伏并没有影响他的家庭。

这样看来，他二十年“舌耕”为业，所得修金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在他看来，担任塾师不利自己的学业、志向和德行，不能躬身尽孝，仰人鼻息，但他一年的修金为一百两银子[53]，所得不菲，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自卑其身二十年，为的就是养家。在他看来，出门教书暂为糊口计，非希图发财，“若希图发财，自当别求一途寻发财之事，余志犹在，乌容使财迷心哉！”言语之间流露出舍利求理的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其间“耕读”思想的脉络，刘氏曾自述其心志：“余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54]。但是其“耕读为业”的思想以及坐馆舌耕，又和科举制度相随相伴，倘若这一制度崩溃，耕读之路断绝，他的经济生命链也必将打破。

刘大鹏是一个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在日记里他总是一个人承担着家庭的重任。到了他的儿女辈，他的家庭规模不断扩大。1913 年 7 月，他有五子、二女、二孙男、二孙女，加上他的妾、三个儿媳，男妇大小共十六口。这显然是一个大家庭，“每日米面所食甚多，费用亦巨”[55]。所以家庭“常受紧逼莫能宽裕”。此时，他已丧失了西席之职，万义生木店的经营每况愈下。1908 年他的父亲、妻子先后离世，1913 年“长妇云亡又娶一妇，次妇又亡，且嫁一女，婚丧之事即俭亦不能无费，此所以积债不少也”[56]。看来，要养活十六口之家，除了耕种十亩田地外，他不得不另图生计，实现生活的转向。

1914 年对刘大鹏个人来说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在生计窘困的情形下，他情非所愿地由“耕读为业”转向“亦农亦商”。从这一年开始他在西山和一个名叫韩实成的人共伙开采德昌庆煤窑，刘氏占三分之二的股份，韩氏占三分之一。1930 年，韩的弟弟因听人闲语而与刘大鹏发生龃龉。刘氏回顾了 16 年来煤窑的经营状况：“虽未大发财源，却年年稍有赢余，尚未亏累”[57]。由此可见刘氏经理煤矿还是达到了舒缓生计的目的。

经营煤窑不是件轻松的事，刘大鹏常入山进峪，驻于窑中。或窑中采煤，或查找矿石，或催讨债务，或管理公事，不一而足。为应对苛虐的税敛，他和其他窑户一起成立了煤矿事务公所，而公所章程出自于他的儿子之手。后来为免徭役之害，他又与众窑首将煤矿公所附设本县商会[58]，他本人在 1921 年至 1927 年担任了南四峪煤矿事务所的经理。像担任其他职务一样，始以推辞未果而担任，终因人心不正有人捣乱而辞谢。煤窑在极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运营，煤厘局人常因公事而加厘，加征加税，日甚一日[59]。由于军阀混战，运煤之车因各县应兵差到处拉车不敢入山拉煤，以致煤积存而不能畅销[60]。尤其是 1930 年后，由于无处贷钱以供采取煤矿之资本以及层层的勒逼，煤窑经营状况愈下，“所放之账不能收回，该外之债无法偿还，又无商家抵佃米面”，以致闭歇者多而开采者少，人皆困苦不堪[61]。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经营的煤窑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1929 经人说合收买了一家煤窑的部分，后来又买下了三眼煤窑[62]。但从别人出卖煤窑的情形，结合刘大鹏的日记来看，刘大鹏是在煤窑生意不佳的时机做了错误的购买决定，因为扩大规模花费了他相当的资金，这可能是导致他后来愈加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1929 年底，煤矿的效益已开始下滑，业主由于无处贷钱以供采矿之资，加之煤矿事务所的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到 1936 年，煤窑多行倒闭或者歇业，所留者亦不挣钱[63]。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煤窑所在的山峪成为红军打击日军的根据地，日军经常进山“入剿”，一些煤矿仍然惨淡经营，但刘大鹏自己的煤窑可能早已倒闭。

刘大鹏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从“耕读为业”到“亦农亦商”的转变，但他的思想观念仍然定格在“耕读”二字。他在 1914 年初的日记里这样写到：“予因穷，厄于乡，无一食之处，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故常常入山整理其事，处于乱世，所学不行，聊藉一业，以藏其身。《中庸》谓：‘居易以俟命也’。”[64]在刘大鹏的眼中经营煤窑乃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之术”，虽然他在入山觅矿、驻窑经管的过程中，美丽的山景颇使他陶然于胸，但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经营煤窑之事常常心中不安而且歉疚不已[65]。他宁愿自称为“老农”[66]，赴田种豆，督工拔谷，在田耘草，灌溉麦田，呼儿率孙。当他年届七十之时，因雇工甚缺，在农忙之际，常到田工作，甚而终日在田，未尝一歇[67]。七十五岁的他因佣工之人甚缺，暂作农人，自认“虽不能抵一个工，抑且能抵半个工”，既省工资，又省饮食[68]。八十岁时仍常在田中工作，毕竟年事已高，“身受劳过重”，朝醒不愿起床，“久之乃起，仍觉疲乏”[69]。躬耕东亩，入山营窑，即使这样的劳苦，亦农亦商，竭力筹划，刘大鹏的家庭生活困厄还是日甚一日。

刘大鹏家庭经济状况向来不宽裕，如他所言，“吾家虽非赤贫如洗，究竟不甚宽绰有余耳”，后来他丧失恒业，又加之婚丧嫁娶、家庭规模的扩大、物价飞涨等因素，刘家“穷困日甚一日，自民国以来，屡遭厄运，无一日之穷舒”[70]。仅吃饭一项，“所食甚多，费用亦巨，此所以常受紧逼而莫能宽裕也”[71]。地中所产，也仅够数月之食，“值此物价异常昂贵之时，寻常受窘，往往告贷以度春秋”。对此刘大鹏责己“龌龊无能，空生于世而愧悔弥深者矣”[72]。愧疚并不能改变现状，刘大鹏的债务之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应接不暇之势”[73]。于是年关在即，外债来逼，新年已过，家极贫穷，将有冻馁之虞[74]，有绝粮之患，欲购无钱，欲赊无处[75]。1938 年 3 月初 9 日，乃至“今朝无米为炊”，目睹其口食之艰，一些友人纷纷接济，赠钱送面，令刘氏感恩不已[76]。

刘氏身虽劳苦，但他对耕作一事从未卑弃过，他早年未中举前在田耕种时，就有人指责他“毋乃不类”，自降其身，而他认为“余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77]。在他看来，耕种为谋生之正途，而其余皆非是，这就决定了刘大鹏后半生是“商皮士农心”。当他在麦田里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时，“耕读”已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和精神的象征。他也始终因为经营煤窑而沦为商人歉疚不已。正是在自己的经历中，在和士、农、商的比照下，他清楚了自己的归属。在农耕和经商的外衣下，依邻晋祠而居的刘大鹏始终跳

动着一颗士子之心。

1915 年 6 月 16 日，刘大鹏接到王少鲁、张友桐、常赞春三人从北京寄来的信函，信中说到，王少鲁等人在北京南城下斜街云山别墅设立山西文献征存总局，并于省城省议会故地设立分局，征求晋省文献，请刘大鹏将本县诸先儒著述悉数搜求，所有独行、孝义、孝贤、烈女，素有传说可考者，也延求访问整理成书寄往局中。刘氏为此事专门谒见了县长李桐轩，告之王少鲁函告他本人办理此事的情况。县长虽言此事可办，但一句改日再议，不了了之。

但这一信息无疑给予这位经历“民国之变”的乡间绅士以莫大的鼓舞和振奋，强化了刘大鹏对地方文化搜集整理必要性正确性的认识，也坚定了他做好这一工作的信心。[78]

赤桥村紧邻晋祠，历史的传说与美仑美奂的建筑，自明以来数百年的以晋祠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祭祀活动，近代以来洋夷的频频造访，无疑激发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刘氏强烈的地方文化自豪感以及一个文化人整理保护地方文化的责任感。这与绅士在地方文化中的领袖作用以及撰修志书的传统正好契合，也使得刘大鹏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最亮丽的色彩。

在晋水流域有三十多个村庄，得利于晋水灌溉，刘大鹏创辑《晋水志》十三卷，又创《汾水河渠志》、《重修孙家沟幻迹》。他曾经营煤窑的西山不仅富于矿产，而且兼具名胜，为此他撰写《柳子峪志》八卷，《明仙峪记》四卷等。刘大鹏早在 1902 年开始撰写《晋祠志》[79]，他自嘲“于课读之暇，消磨岁月”，其实在编撰过程中以古人著书的精神砥砺自己，“著书非一次即成，必易其稿，且非一易，易之又易也”。他手不停挥，删繁就简，甚而三更乃寝。难能可贵的是，为了周知情形，刘大鹏一有闲暇则奔赴晋水流域的村庄调查采访，时达四、五年之久，不辞劳苦，不厌烦渎[80]。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值得敬佩和学习的。

刘大鹏的著述并不限于乡邦文献，他还著有《梦醒庐文集》八卷、《卧虎山房诗集》三十五卷、《从心所欲斋妄咏》五十卷、《啄玉间咏》八卷、《衔恤录》十卷、《寄慨录》十二卷、《随意录》四卷、《潜园琐记》六卷、《游绵山记》二卷、《唾壶草》二卷、《遁庵随笔》二卷、《迷信丛话》十七卷、《愠群笔谭》二十五卷、《乙未公车日记》四卷、《戊戌公车日记》六卷、《桥梓公车日记》四卷、《刘氏世系谱》三卷、《藜照堂家训》二卷、《梦醒子年谱》十二卷、《退想斋日记》二百册！[81]可谓著述连篇，卷轶浩繁！刘大鹏生前将《晋祠志》四十二卷，重行整理为十六卷，删繁就简，意在印刷时价廉而工省，“予本贫穷，无力刷印，拟醵金以刷印，未知能否办到”[82]。可惜，刘大鹏的著述生前皆未杀青，良可浩叹。藏往知来，文献足征，修葺庙宇，保存古物，刘大鹏践履了文化的职责，完成了一个地方绅士的文化使命。

1942 年，这位八十六岁的乡间绅士，记载了一场淙淙滴滴的秋雨后，远离了他的那个时代。

结　语

刘大鹏的一生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痕，既反映了绅士阶层变迁的普遍特征，又突出了内地乡绅鲜明的个人色彩。他奋志青云五次科考，舌耕度日二十年，过着科考与舌耕相济相需的生活。科考废除，恒业丧失，他始终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绅士地位不一定来自财富，也不一定带来财富”[83]。这一点在刘大鹏身上是最好的体现了。在奔竞纷扰之世，他没有效俗趋时而劣化，也没成功实现自身的转型和生命的蜕变，而是无奈地选择了持守和敛藏，过着亦农亦商的劳苦生活，在调适、矛盾、挣扎、困厄、落寞、固守中，践履着绅士的文化职责，诉说着一个内地乡绅怀才不遇及其时代的故事。

---

[1][13][81]阎佩礼：《刘友凤先生碑铭》，见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13 页；614、615 页。

[2][3][4][5][7][8][10][11][12][14][16][21][22][25][26][27][28][29][30][31][32][33][34][35][37][38][39][40][41][42][43][44][45][46][47][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2]刘大

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页 613；35；38、592、594；595、600；42、594、595、596、598；21、41、48、55、64；530；40、61；62、65、68、73、74；79—85；101、112、116；42、43；146、147；463；59、451；54、55、57、59、70、71、140；198；72；57、59、71；55、56、61、108、127、130；57、66、140；66、72；24、88、101、156、157；61、71、155；57；147、148、149；159、180、184；191；433；196；178、179；336；427、468、470；180、186；451、454；149、167、190、191；206、242、317、383、384、491；44、107、194、232、263、328、445、450、451；6、26、54、90、170、212、259、273、436、463、477、480、552、591；88；45；185；190；399；214、215、218、219；224、280、368、390、402；322、390；474、475、489；391、394；474、493、495；192；203；187、262、263；331、332；431；495；269；185；228；239；401、403；494；525、527；45；233；131、133；161；239。

⑥罗志田在《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一书中，认为刘大鹏看到京都士子科举以习字为先，是缺乏科考常识，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多为其他学者接受，而这一点值得商榷。因为他在日记里提及京都士子习字之后，再没有提及自己练字的事，若是赞同“以字为先”，刘大鹏应该日日练字才对，但日记里没有发现有关内容。这和他大量购买新学书籍和研读时务之策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⑨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5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⑮刘大鹏：《桥梓公车日记》，见前揭《退想斋日记》，第 604 - 612 页。

⑰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1 页。

⑱⑲罗志田、葛小佳：《东风与西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 260 页；第 261 页。

⑳刘云彬：《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见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 3 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5 页。

㉓㉔㊇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0 页；第 222 页；第 220 页。

㊱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 5 册第 5390 页。

㊽《退想斋日记》第 384 页为“里满庄”。

㊾《退想斋日记》第 317 页店号为“万意生”，第 383、384 页的记载均为“万义生”，在第 242 页又称之为“万义和”。